

笔底春秋

亲历中国科教改革

张碧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笔底春秋

亲历中国科教改革

张碧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底春秋: 亲历中国科教改革/张碧晖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30-3739-6

I. ①笔… II. ①张… III. ①科学技术—技术革新—技术史—中国 IV. ①N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2126 号

责任编辑: 李 潇

责任校对: 董志英

封面设计: 李志伟

责任出版: 刘译文

笔底春秋

——亲历中国科教改革

张碧晖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编: 100088)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bs.tmall.com>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3

责 编 邮 箱: lixiao@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
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ISBN 978-7-5130-3739-6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笔底春秋 | 目 录
——亲历中国科教改革 Contents

第一章

求学阶段 初试教改

- 激情岁月，青春励志 / 3
交大读研，经历风雨 / 14
毕业分配，前途迷茫 / 20

第二章

走上社会 建设三线

- 穷乡僻壤，艰难面对 / 27
迟迟成家，尚未立业 / 34
初入政坛，当了秘书 / 42
波折不断，跌宕起伏 / 47
关键转型，良师相助 / 56

第三章

科学春天 迎接挑战

勤研苦作，恶补知识 / 63

提高起点，跨越发展 / 67

学术活动，三次难忘 / 72

进讲师团，讲管理学 / 77

新开发区，武汉为先 / 81

振荡原理，当上领导 / 87

小荷露尖，壮志不已 / 91

有封雅号，其实难副 / 95

崭露头角，登上大报 / 101

思想工作，努力创新 / 105

能上能下，重执教鞭 / 109

第四章

科技成果 重在转化

两赴英伦，开启交流 / 115

科学园区，赴美取经 / 121

东渡日本，厘清市场 / 126

德国掠影，异彩纷呈 / 130

“通用”谈判，步履维艰 / 137

三顾茅庐，进入科委 / 141

脚踏实地，先做实事 / 145

结合经济，突出改革 / 149

思想解放，拒绝陈腐 / 155

尊重历史，饮水思源 / 161

告别科委，心向教育 / 165

第五章

大学教育 回归理性

南下开拓，追梦之旅 / 171

目标番禺，重回教育 / 175

平地创业，做开荒牛 / 181

筑防火墙，经受考验 / 189

筚路蓝缕，酸甜苦辣 / 192

体制创新，办出特色 / 198

内外交流，春华秋实 / 206

深入调研，酝酿改革 / 211

退休落幕，泰然处之 / 216

第六章

珍惜亲情 感恩友情

主持学会，当上义工 / 223

诗书雅兴，乍尝浅止 / 230

大儿发奋，考上北大 / 236

一生坎坷，母亲仙逝 / 240

罹患重疾，坦然面对 /	245
夫妻结伴，愉悦旅行 /	250
和钱伟长谈教育改革 /	260
实于家李绪鄂 /	263
我和龚育之的交往 /	266
改革风云人物吴明瑜 /	270
人生路上，三位恩师 /	275
科学学的“四君子” /	280
三位同学，曾是同行 /	284
后 记 /	288

第一章

求学阶段 初试教改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了学习苏联经验中有“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教条主义错误，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次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批判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指出教育工作中存在着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半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1958年5月起开展的“教育革命”，是试图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初步尝试。

由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大形势的变化，使全国高校开展了对教学观点、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大清查，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许多高校把教师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不同看法，当成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阻力，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作为资本，与党较量，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用搞阶级斗争的方式搞教育革命，使一批富有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被错误地批判，师生关系紧张；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被随意变动；教学秩序被打乱；从而使教学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直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解决经济工作中比例失调的问题。紧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确定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强调要通过调整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在这种正确方针指导下，后来的几年，是我国大学发展比较好的时期，我的大学生活正是在这段时期。

激情岁月，青春励志

我出生在江西省樟树市张家山村，老祖宗据说是从甘肃天水迁徙过来的，到我已经第 20 代了。我的童年十分悲惨，一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在老师和政府助学金的帮助下，我受到了好的中学教育。我就读的樟树中学，是 1924 年成立的百年老校，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教师，为我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甚至“反右斗争”，我都经历了，但毕竟不是成年人，印象比较肤浅。真正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并参与其中，还要从考入大学说起。

我的一生，经历了少年立志、青年求学、中年从政、壮年办学、晚年反思，和共和国的历程紧密相关。其间最重要的一段，是我亲历中国改革 30 年，并在科技、教育改革中探索，而这又要和前面的经历联系起来。1958 年，我考进了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

华中工学院是根据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精神，于 1953 年成立的。它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 4 所综合性大学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合并组成。华中工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建设发展起来的一所重点大学。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华中工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华中工学院坐落在武昌洪山区的喻家山下，由于建



1958 ~ 1965 在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和工作。

校才五年，山上并没有多少树。学校前面是关山工业区，当时一到晚上，处处灯火明亮，一派建设景象。后来建成了武汉汽轮机厂、武汉开关厂、武汉鼓风机厂等一批工厂。华中工学院占地 3000 亩，原来准备三院建制，南边的水利学院未搬来，暂分东西两区，东边是机械学院、西边是动力学院，建筑设施类似，东、西边除了教学大楼、实验楼、宿舍外，两边都有学生食堂和操场等。

1958 年上半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同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在此之前，他还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破除对教授的迷信”。我们入校前，学院已经在党内外作了动员，从 8 月下旬开始，开展了对教学观点、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大清查，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掀起一场“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我们一进校，就开始批教授，记得一个晚上，去露天电影场批判机械系的一位有名的教授，硬说他自称是夹具专家，其实是“草包”，不学无术。据说当时被批判的教授、副教授有 30 多人，约占总数的 70%，被批判的老讲师也有 30 人，约占总数的 40%，后来还波及学生，一些出身不好，喜欢钻研的学生也被“拔了白旗”。记得当时有一位高年级学生名叫张治水，曾向中央写了一个什么建议，结果在全院进行批判，省委领导还来讲。有一位学者后来在一份杂志上回忆说：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泽东晚年有微词。信写得很诚恳，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1959 年第 14 期上，谁知那时正在开庐山会议，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泽东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在枪口上。这位同学有句名言：“人一生要找对两个人，一个是领导，一个是老婆。”我当时觉得讲得

还真有点道理。在“破除对教授的迷信”的口号下，我们刚刚入校，就要我们重新编写教材。当时的一位副教务长，口才极好，富煽动性，他做报告时，提出“打倒牛顿，推翻虎克”。我们确实被弄糊涂了，难道这就是大学吗？

我们还赶上了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的运动。1958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当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一年钢产量翻一番。9月初省里布置，要我院在11月底之前生产出800吨生铁、1100吨钢，并强调要“土洋结合，与时间争钢铁”。学院决定，分别在京山县和本院建一批土炉子。在校园东南部，很快建了一批土高炉。我们停课闹革命，分三班轮流去炼钢铁，每天约3000余人上阵。后来因为根本完不成任务，到省里反映后，才逐渐恢复上课。大办工厂也是当时一种时髦，认为“工厂大办学校，学校大办工厂”是走“又红又专”的大道。学院当时有一个“大战150”的运动，就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要生产150台车床，支援地方工业。一些地方厂矿纷纷送来生猪，正好当时是人民公社运动，还真过了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在进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课很不正常，除了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外，还有勤工助学，在工厂的时间不少。我在铸造车间做泥蕊三个半月，在机加工车间开车床两个月，在焊接、铸造车间各半个月，这些实践倒是结合金属工艺学这门课的，对于学工的学生来说，确实有不少好处。但是教学秩序完全打乱了，系统学一门功课的安排较少。这两年，有些功课也没有学好，例如高等数学，本来我高中数学不错，一方面授课教师是广西人，有好些话听不懂。另一方面，课后又未很好复习，没有抓紧做作业，所以这门功课没有学好。

由于“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和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就出现了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加上1958~1960年的三年中学校发展过快，要求过高过急，没有注意劳逸结合，严重地影响了师生的身体健康。1960年底即开始发现师生体质明显下降，疾病大量发生。据统计，至1961年初，全院肝炎病患者达1353人，浮肿病患者达3300人，妇女闭经病患者812人，三种病人共达5565人，占全院总人数的45.4%。记得当时有个文件，还提到关系到民族的存亡问题。定量减少，猪肉供应紧张，经常有饿的感觉。学



院当时给浮肿病人发一种米糠（经过加工），我因为没有病，闻着还觉得很饿。同年级的一位同学是华侨，海外有人给他寄白糖和乳酪。他经常叫上我到学院的“新寒宫”餐馆买上几个馒头，算是特别的美餐。那个时候，到城里吃饭，除了粮票和钱外，还要一种“进餐券”。有一次到汉口，因为没有“进餐券”，只能拿着钱和粮票，望饭兴叹。

1959年底，我们还参加了修筑汉丹铁路（汉阳到丹江口）。我们步行加水路到达云梦县，历时约一个月。我主要是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写写稿子，出黑板报，鼓舞士气。后来我也要求参加挑土，虽然劳动强度大，也不甘落后。回校不久，党支部根据我一贯表现，决定吸收我入党。1960年2月28日，经张庆生、陈来顺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这两年大学生活中最大的收获，从此，我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了。

1960年6月，系分团委书记通知我，要调我到哲学教研室任教。说学校发展很快，特别缺老师，决定一部分学生提前结业。考虑我又红又专，基础不错，相信我能胜任新的工作。加上我又刚刚入党，虽然说毫无思想准备，也只有服从。大概有十多个二年级和一年级的同学，分别调入了哲学和经济教研室。报到后，大家都领了一本艾思奇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很茫然。自学了几天，就要我们上阵，当助教，负责答疑。我们自己也没有搞懂，怎么答疑。有一次晚自习，许多同学提出问题，着实招架不了。我说今天时间不够，明天我们集体答疑。经过准备，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总算蒙混过关了。我发现调来的人，包括先于我们调来的，大多不安心，只是大家不敢讲。有位同事是广东潮州人，学习成绩很好，他年龄比我大，情绪很大，很不愿意做政治老师，忍不住表露出来。反映到上面去，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结果还得了肺病，情绪很差。

暑假过后，有一个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机会，当时教研室决定让我去。我说我还年轻，今后进修的机会多，让给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师去了，这也是改变人一生命运的决定。不久我就去造船系当分团委书记，当的时间也不长，只是代替党总支书记到食堂蹲了一个月的点。后来，学校又送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党校在汉口万松园路，算是中心地带。一人住一个房间，当时因为是困

难时期，要劳逸结合，只上半天课，中午没有菜，我们就用味精酱油拌饭，也很香。同学中大多是厂矿企业和县委宣传部的干部，我基础比他们好，学习一点也不吃力。党校图书馆藏书丰富，我半年时间看了三四十部名著。当时正是“反修防修”的年代，形势报告听得比较多。党校的老师水平也较高，有一位讲哲学的中青年老师，讲课非常精彩，听他讲课简直是享受。党校副校长杨锐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搞哲学，一是要能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包括前沿科学的成就；二是要洞察社会现象，包括看小说，也是了解社会现象的一个渠道。若干年后，我们在武汉还一起开过会，他发言时老讲发电多少“瓦千”，我们还笑得不行。在党校每周还可以看一两次内部电影，除了像受批判的《雁南飞》等外，经常看类似《参考消息》的“参考片”，确实使人开阔眼界，耳目一新。

1961年初，我结束了在省委党校理论班的学习任务。接着就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员，到湖北麻城县白菓公社一个大队参加运动。同时去的还有几位教师，他们都分到生产队去，很辛苦，粮食定量少，基本没有菜，要自己开火做饭。我被留在大队跟着工作队长，这位工作队长是供销社的一位领导，对农村很熟，工作能力也很强，我跟着他，学到不少知识。生活上也相对比到生产队的同志要好些，经常有农民送点蔬菜给我们吃。这个队在“大跃进”中很有名，曾经“创”下亩产53000斤的“大卫星”，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还作为全国劳模到北京开会，并到北京农业大学做报告，一时风光无限。我也曾向他问过“内幕”，这位支部书记在农村算有点文化，读过几年私塾。在湖北“大跃进”中首先创造纪录的是另一个公社，计亩产36000斤。这个支书去开过现场会，他很快看出门道，高产的做法即把许多田地的熟稻子往一块田里搬。他回来很快就如法炮制了，据说验收时，省、地都来了领导，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个支书倒是很坦然，他和我谈得来，什么都给我讲。这个队虽然在山区，但倒很开放，譬如这个村子屋连屋，从第一家可以长驱到最后一家，我睡的房间，早晨就有人川流不息地走来走去。这里的人很客气，走路时，当地人一定要我们在前面走，我们人生地不熟还要不时回过头来问路。当地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逢年过节，初一、十五都要煮糯米饭，恰好



我也喜欢吃，至今这个爱好都没有变。我们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特别照顾，就是每人每月发几包当时湖北比较好的“龙菊”香烟，我抽了一支，第二天起来特别难受，赶快把香烟送给了别人，没有学会抽烟。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是两条：一是纠正大炼钢铁时的“共产风”，当时大炼钢铁时把群众的铁锅等都砸了炼铁，现在实行退赔。二是纠正干部多吃多占的不良作风。两项工作都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两项工作也都是和风细雨，也没有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还是在党校学习的时候，我和也是提前抽调出来的院团委组织部长就了解到，我们这批抽调出来的人是没有计划批准的，也就是说当老师是黑户口。我们这些抽调出来的人绝大部分都不安心，但是鉴于前面的教训，谁也不敢提出来。我和那位组织部长决定给省里写信反映，省人事厅一位像领导的同志还找我们谈了话，肯定我们反映情况的做法，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学院的做法。后来学校也知道我们反映了情况，虽然没有公开批评，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让一位也在党校学习的党员干部对我实行监视；在通过我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会上，批评我的所谓个人主义。这时，被抽调出来的其他人更是怕得要死。我依旧坚定信心，相信自己的意见是对的，终于到1962年4月，院人事处通知我回去学习专业课，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那位团干部，到9月份，又通知其余十几位回去学习专业课。我知道，这是对我和那位团干部进行打击报复，我等于少发了三个月工资。这样，除了两三位可能觉得回去学习有困难的外，我们那批抽调出来到哲学教研室任教的近10位同志都回去继续学习了。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那位广东同事，笑容满面，他学机械专业，如鱼得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研究院，“文革”中还偷偷搞业务。改革开放后到意大利进行合作研究，是该单位的业务尖子，现在七十多岁，单位还不让他退休。

学院对提前抽调的学生一个最大的优惠，就是回来继续学习前可以随意挑选专业。很多人都选了比较热门的专业，只有我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专业学习。当时，学院正在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高教六十条》提出“高等

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此，学校调整了教学安排，减少了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的任务，控制了社会活动，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强调了加强基础课和保证各教学环节的基本训练。学生的学习情绪异常高涨，当时机械系有一位工农调干生张凤球，刻苦钻研，成绩优秀，成了全院学习的典型。我还向法院刊投了一篇稿，题目是《张凤球的学习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文章登在报刊上，得了三元钱稿费。

不久，机械系（此时是机一系和机二系合并在一起）分团委书记张庆生要我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在入学时，张庆生本来和我们是同学，后来他也调出来担任干部，不久就成了机械系的分团委书记。其实，张庆生虽然是工农调干生，但学习成绩不错。他可能受当年赫鲁晓夫讲自己是煤矿工人出身影响，也常常在大会上讲自己是裁缝出身。他工作有魄力，只是简单粗暴一点。我做系学生会主席，除了配合系领导抓正常教学秩序和生活管理外，最主要的是两件任务：一是开展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有健康的体魄；二是开展文娱活动，活跃气氛。我们学生会干部都多才多艺，有一次晚会，学生会干部组成演奏队，奏了一曲《金蛇狂舞》，我不会乐器，就当指挥。体育活动，除了经常的锻炼和赛事外，就是一年一度的新生运动会和全院田径运动会。我们系有两千多学生，是全院学生最多的系，人才济济，在全院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系总是第一名。特别是在开幕式的出场式上，我们精心策划，总能给全院以惊喜。新生运动会也组织得好，每年都能发现不少新人。我当系学生会主席后，每年春夏之交还举办一次“一系之春”，除了文艺晚会外，还有书画展。每次文艺晚会，我都要写一副对联，什么“柳絮横飞”“春意盎然”都要组合上去。除此之外，每年的迎接新生也是学生会的一个大活动。迎新我也比较关心，它可以发现一些人才。

担任系学生会主席，也使我有一些参加重要活动的机会，开阔了眼界。当学生干部不久，就参加了院学生会欢迎古巴全国学联访华活动，看到英姿飒爽的代表团成员，心情无比激动。那时我记得中国学联主席就是后来当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相信现在很少有大学生知道全国学联主席是谁。我们学生会还有一